

0409

兴县文史资料

政协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一期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发 刊 词.....	(1)
抗日战争前晋西北唯一的一所中学——兴县 县立初级中学校.....	(2)
红军东征兴县.....	(1 4)
记老红军冯敬魁同志.....	(1 9)
孙良臣传略.....	(2 6)

发 刊 词

《兴县文史资料》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创办这个刊物，目的是为了动员和吸引众多的人参加我县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撰写及研究工作，以便广泛地征集和积累资料，为将来系统地编写我县现代史准备条件，同时为上级有关单位提供素材。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刊物激发读者的爱国爱乡热情，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兴县文史资料》主要刊登戊戌变法以来我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演变的资料。以及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

资料必须真实可靠，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客观的记述和评价，既不歪曲贬低，也不粉饰美化。

我们将实行群众办刊的方针，希望各界人士踊跃投稿，特别欢迎老一輩的同志写回忆文章、见闻录、目击记等第一手资料。

由于我们业务生疏，水平有限，工作中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大家给以批评和指正。

抗日战争前晋西北唯一的 一所中学——兴县县立初级中学校

兴县僻处晋西北黄土高原，地瘠民贫，交通闭塞。但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社会较为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兴县书房林立，人才辈出，一时文化颇称繁荣。到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地方财政支出，学校无法兴办，文化日渐落后。“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地方上一部分有识之士，深感要振兴中华、挽救国家，必须依靠文化科学，欲求文化科学发达，必须兴办教育。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在心余力出的情况下，全县只创立了两处高小、四、五十处小学，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高小发展为四所，小学发展为一百零一所。这与广大农民的要求与适龄儿童的比例，差距仍然很大。高小毕业后，绝大部分失学，即使少数有志升学的青年，也只有长途跋涉到四百余里以外的太原就读。花费又多，诸多不便。这样大部青年望洋兴叹，不敢问津，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兴县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绅士有鉴于此，遂竭力倡议创建一所中学，以满足广大青年学生的要求，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一、创建与经过。

1925年（民国十四年）春，兴县进步绅士，原任二高校长牛友兰（名照芝）先生倡议在兴县成立一所初级中学，首先得到财

政局牛映台、劝学所（即教育局）贾克明，女学校校长邢肇迁等先生的积极参与，接着受到县长薛登俊（稷山）的赞助，倡议遂变为事实。他们组成董事会，设董事七人为：牛友兰、牛映台、贾克明、邢肇迁、温祺铭、王忱、李桂芳（商会会长）。公选牛友兰为校长；邢肇迁为学监；王忱为庶务主任。择定东关寿圣寺（俗称大寺）为校址，捣毁了神象，建成校舍。在建校过程中，牛友兰的商号“复庆永”几乎成了兴中的后勤部，需要什么，它给供应什么。这个学校定名为“兴县县立初级中学”（简称“兴县中学”），是年八月份第一班学生入学了。关于经费问题从这所学校开始到结束，一直是困难的。当时财政局多年积存了一部分罚款积余，董事会征得薛登俊县长的同意，将这部罚款积余发商生息，作为学校基金，临时募捐、县财政少量拨款，作为修建和开办费。筹建创伊始，毕路蓝缕，然而史无前例的一所中学校居然屹立在寺塔梁上。兴办教育，改变愚昧落后的面貌，本来是件好事，理应受到各方的拥护与赞助，但是反动派也还是大有人在。城关有部分绅士和富户，甚至有些政府官员，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兴县是三等县，贫困县，过去赋税，摊派都较轻，中学成立会招来增加负担之祸，百般阻挠。但牛友兰先生和董事会同仁，坚持到底，不为所动。当然反动派那些见不得人的理由，经不得考验，也就不驳自倒了。

这个学校的办学方针，就是要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从它的校训里也可以看出这点来。它的校训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也就是要求学生，立身、处世要“恭”，要“忠”，而对学业则要求在“敬”字上下工夫。它和当时流行的“敬业乐群”、

“端品励行”的校训相仿。所以这个学校除了重视学科学习外，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特别重视。因此这里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风气很浓厚，违犯纪律的现象很少，校风校貌一片蓬勃的景象。

兴中学生来源很广泛，除兴县的学生外，附近的保德、岢岚、岚县、临县以及陕西神木、府谷、佳县的学生也闻风而来。在开办之初的第一班大部分是兴县应届和往届的高小毕业生。从第二班以后兴县和外籍的学生几乎各居其半。因为当时附近各县都没有中学。他们来兴就读比到太原省钱而又方便。因此说兴中是抗日战争前晋西北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兴中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基本上和现在的中等学校相同。科目有：英语、数学、国文为主科，每周六节；副科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公民（主要讲《三民主义》）、音乐、体育、美术等科。这些科目都是根据当时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而开设的。至于学制一二三班是四、二制（即初中四年、高中两年），以后改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兴中共办了八个班，培养学生共约三百余人，时间为十一年，1936年下学则停办。停办的主要原因是经费无着。1935年县长李凯朋就借经费困难，勒令停办，全校师生召集了董事会，决定拒绝停办，并派代表向县政府据理力争，李凯朋县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到1936年红军东渡后李凯朋出于“防共”目的，惟恐兴中学生响应红军，借经费拮据，旧事重提，迫令兴中停办，牛友兰和兴中师生感到势难继续维持，只好停办。八班未毕业的学生大部转学到太原各校，有一部分学生失学。

1928年（民国十七年），兴中又附设个二年制乡村师范

班，专门给地方培养小学教师，先后两个班，共六十余人。1935年牛友兰又利用兴中校舍，附设了一个高小班，共四十余人，他自己兼任校长，千方百计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

二、师资与设备

兴中的师资质量较高，大部是由太原招聘而来，而且都是省内外的大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各有专长。如创办之初，即从太原聘请梁崇秀（字昆玉、忻县）先生任数理化教师，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精通数理化，受聘前在太原国民师范任教；以后陆续聘请常裕仁（字海天、忻县）先生任英语教师，他是早期山西大学文科英语系毕业，擅长英语、语文；李雪如（墨斋、兴县）先生，山西大学文科中文系毕业；为山西名流张贯三的高足，语文教师，对中国古典文字及考据学较有功力；胡献番（离石），山西法政专门毕业，语文教师，语文基础较扎实；孙文绶（河北完县），北京中国大学毕业，历史教师；胡遵法（山西文水），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地理教师，又是书法家；后来聘来的教师有：张国权（崞县），北京大学毕业，语文、英语教师；王法汤（静乐），山西大学工科毕业，数学教师；朱聪敏（兴县），法政专门毕业，语文教师；高克恩（兴县），政法专门毕业，语文、历史教师；刘献君（兴县），山西第一师范毕业，后期任兴中学监，附师班主任，兼一部分付科；刘安芳（菊初、离石）清贡生，师范班主任教师，擅长文史。

以上仅列举几位教师的简单情况，从他们的学历和简历就可以看出这个学校的师资质量是相当高的。其中对学生影响较大的前期

为梁崇秀、常裕仁；后期为刘献君、张国权、梁崇秀为人正派，教学认真，对学生传授科学基础知识出了很大力，博的各方面的好评；他虽不多过问政治，但他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表示拥护的。常裕仁在“五四”时期就被选为山西大学的学生代表，负责宣传工作。又参加过当时山西的争矿、反房税等运动，所以他的民主革命思想较为浓厚，同时他对宣传工作经验丰富，举凡讲演、编演戏剧等宣传手段都很熟练，兴中历来举行晚会，都由他组织领导，在教学上，他教的英语、语文效果都很好，特别他强调课外阅读，经常给学生介绍现代中外名著。因此受到学生的尊敬。刘献君是兴县的老教育工作者，他在学生时期就阅读过不少进步书籍，所以思想进步，品学兼优，不少学生受了他的言传身教，走上革命道路。张国权在当时表现的很进步，有时公开谈马克思主义，1934年冬我从太原回兴，到兴中访问母校，他对我谈到国家前途命运时就提出：“中国将来必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才能挽救国家危亡”。我当时认为他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学生普遍对他反映很好。谁料抗日战争期间他投奔阎锡山政权，坐了官，46年春他又跑回解放区。至今我也弄不清他的真面目。

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很大，兴中前期教师中有李雪如擅长于诸子百家，给学生选讲《庄子》、《韩非子》、《荀子》等子书的篇目，温祺铭熟悉《左传》，给学生讲《左传》，学生趋之若鹜，一时读古文写古文成了风气。为此牛友兰曾向李雪如提出让学生多读些报刊杂志，多写些通俗易懂的如报纸上那样的文章，李却说：“那你可以请些记者来教语文嘛”。虽然如此，兴中学生古文基础一般较为扎实，不能不归功于这些老先生。

正因为兴中师资力量较高，培养出来的学生学习成绩是很可观的。如第一、二班毕业后，绝大部分到太原升学，其中很多人被山西大学、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商业专门、农业专门等大专学校和进山高中、云山高中等校录取，而且都名列前茅，一鸣惊人，受到省县的赞扬与重视。从第五班开始实行毕业会考，结果学生全部毕业，而且成绩列在领先地位。从此以后兴中蜚声全省，很有名气，成了同回县的最高学府。

兴中的设备很简陋，校舍在原有寺庙的基础上逐年修建，初具规模，足符应用，图书仪器虽每年购置一部分，仍感短缺。这个学校也算得上一个勤俭办学的典型了。

三、社 会 活 动

兴中学生一般年龄较大，接触社会广，特别受“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和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很深，再加一些具有进步思想教师的熏陶，所以他们除在校认真学习各科知识以外，他们也关心国家大事和地方上应兴应革的事。从第一班开始至八班结束，中间十余年工夫，他们的社会活动很频繁，对社会的前进起了促进作用。特别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较大贡献。就回忆所及的一些活动，即可说明这点。

1926年春，兴县黑峪口禁烟委员王殿锦（阳曲），贪污巨款，舆论沸腾，但县政府充耳不闻。兴中学生对此非常愤慨，立即开会游行，散发传单，揭露其罪行，并请县政府查办。县长范茂松被迫接受学生要求，将王殿锦逮捕押解太原法办。

1925，6年间，兴中学生一遇节日（如新年、国耻，“国

庆”等），经常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当时学生胸前都佩带“抵制日货”的徽章，而且结队到市场检查日货，这一措施很起作用，市场商人不致公开销售日货，也不敢再进入日货。当时抵制日货，确实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个致命的打击。

在北伐战争开始，兴中学生热烈拥护，积极响应。1926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山西阎锡山看到北洋军阀末日来临，宣布响应北伐，悬挂青天白日旗。这时以兴中师生为首，召开了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学生们集队游行，上街宣传，标语、传单充满大街小巷，到处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同时听到北伐军叶挺在汀泗桥打败大名鼎鼎的吴佩孚，学生心目中把叶挺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无不衷心敬佩。这时学生思想上对北洋军阀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连年内战，造成国家分裂，民不聊生的局面是坚决反对的；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新《三民主义》是竭诚拥护的。随着北伐军每一个胜利步伐，学生都有庆祝、宣传活动。在这一时期里也演出过许多革命的节目，其中记得有《孙中山》、《二七大罢工》、《冬烘先生》、《收回租界地》等，城关群众，扶老携幼，踊跃参加，看了这些革命现代戏，赞不绝口，很受鼓舞。在历次出演节目中常裕仁先生是总导演，并亲自扮演角色，博得群众的赞扬。时隔不久，看到报刊上接二连三地登载着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和工人，提出“清党”口号，开除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等同志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职务；紧接着长沙的“马日事变”，武汉的“分共会议”接踵而至。一时乌云翻滚，恶浪滔天，真使人困惑不解。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无不渴望北伐军乘胜前进，挥师北上，攻克平、津、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统一中国，而蒋介石

不此之图，中途叛变，屠杀人民和自己的朋友，这种使亲痛仇快的背叛行径，兴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坚决反对的。兴中学生尽管当时没有接触共产党，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是追求真理的。他们始终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拥护团结北伐、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对破坏团结、屠杀人民的罪行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

1928年8月间国民党派李资、郭理修回兴正式登记党员，兴中师生由于相信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所以大部集体参加了登记。这时他们想利用兴中力量以壮大他们势力。但他们回兴后秉承他们主子的意旨，不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宣传“清党”、“反共”，动不动给人加上“可疑分子”的帽子，大肆挑剔各机关和兴中的毛病，美其名曰“革命”，甚至他们妄图夺取牛友兰在兴中的领导权。这年的阴腊月二十五日，他们乘兴中放假之机，召开“国民党兴县代表大会”，而兴中没有一个正式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是李、郭县党部和兴中矛盾的公开表现，他们妄图摆脱兴中，独树一帜。排斥了占全县国民党党员的过半数的兴中代表，怎么能成为合法的代表大会呢？所以尽管他们拼凑了一个代表大会，产生了个县党部，绝大部分党员是不承认的。1929年4月，兴中师生以党员名义，开大会，发宣言，宣布该县党部的非法，宣布了李、郭等人十大罪状，联合各机关代表，一举查封了该县党部，砸毁了它的牌子。李、郭闻风潜逃。县长王金贵派警将他们抓获，拘押二十余日释放。释放后李、郭跑到太原告状，国民党省党部派人来兴调查，听信一面之词，于这年秋季宣布：李郭回兴恢复县党部工作；解散兴中区党部，兴中党员听候重新登记（以后

没有登记，等于开除）；永远开除牛友兰、邢肇迁、蔡尚仁、贾维楨二十余人的党籍，理由是他们是主使者和捣毁县党部的祸首。从此以后兴中师生与国民党一直敌对到底。

1930年春，阎冯讨蒋战争爆发，山西国民党自动撤走，兴县也不例外。1930年冬阎冯讨蒋失败，阎锡山逃居大连，1931年春，山西国民党卷土重来，兴县李郭县党部又死灰复燃。到这年12月5日太原学生集队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国民党省党部枪杀学生穆光政，太原军警宪查封国民党省党部，扣押了省党部首领苗培成、韩克温等人。兴县留省学生代表贾维楨等由太原归来，联合兴中师生在东关戏台召开了“穆光政追悼大会”，会毕第二次查封了国民党的兴县县党部，驱逐该党部人员。从此国民党在兴县停止活动。兴中学生两次查封国民党县党部，兴县人民拍手称快，对兴中学生无不表示赞扬，而对国民党分子无不表示唾弃。

“九·一八事变后，兴中学生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声讨日寇暴行，师生登台讲演，声泪俱下，听众深受感动。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唤起民众；电请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收复失地；继续抵制日货，倡用土货等等。收到很好的效果，使广大人民，同仇敌忾，对抗日救亡有了初步认识，为后来党在兴县开展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5年，2月在西关大舞台集会，兴中师生登台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群众，兴中教师张国权讲话语言流利，内容生动，颇受听众欢迎。

“九·一八”至“七·七”事变的几年过程中，兴中学生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各个国耻纪念活动。同时他们对共产党

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号召，表示拥护；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和“剿共”、“防共”的反动政策，是坚决反对的。

“七·七”事变后，在太原的兴县留省学生（大都是兴中毕业生和转学学生），以王植、王茂森（现名王力波）、裴绍晋（现名裴亚东）、康明玉、牛联康、郭佩岚、康振仪（现名方彦）等同学为首，在太原参加了牺盟会，回兴县协助县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在壮大抗日力量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兴中历届毕业生，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绝大部分激于抗日义愤，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们有的参加了群众组织，有的参加了部队，也有的参加了行政和教育工作。他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都成了骨干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抗日战争开始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使他们沿着党指引的正确路线茁壮成长，大部分同学由民主主义战士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四、桃李芬芳

兴县中学创办以来，经历了十一年，培养了三百多名学生，时间不算长，培养人也不算多；但这批同学（含师范班、高小班）一开始就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大都是爱国的、革命的；有不少的同学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建国后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担任重要职务，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辉煌贡献。就如兴中早期毕业同学牛荫冠同志在清华大学时期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期间为山西牺盟总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历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晋中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总社主任等职，现年逾古稀，仍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北京的还有孙言民曾任煤炭部处长；郭佩岚（郭景天）曾主编俄华辞典、苏联小百科辞典等书；裴璧任四机部无线电器材经理部副经理；牛在芬任铁道兵总部副军级干部。在青海的魏进德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即任兴县县委组织部长，建国后调任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现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云南的牛志华同志擅长机械工业，解放太原后，接任太原兵工厂厂长；后调任云南农业机械厅副厅长。在江西的牛何之（原名牛在华）原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甘肃有杨桂根历任甘肃省财政厅长，现任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刘福音（后名唐西民），曾任云南日报主编，后调任吉林省图书馆馆长。兴中同学在四川的不少：王植曾任四川省统计局局长；裴亚东任719厂党委书记；康玉明曾任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现任该局顾问；温国光任四川民政厅处长；王振东任四川卫生厅处长。在内蒙古工作的有范易（瑞藻、崑县）历任集宁地委书记，包钢党委书记。在陕西的兴中同学也不少，如：杨再清曾任榆林专署专员，现任省粮食局局长；牛联棣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主任；马俊升任榆林专署文卫局局长；孙启晏任西北纺织学院副院长；任昌任陕西省直属党委书记；刘武雄任宝鸡市干休所负责人。在太原的有：王力波原任太原军区后勤部部长，正军级；刘念晏任太原市商业局副局长；王芝田任山西冶金设计局工程师；康秋泉任山西大学副教授；王芝明任山西药材公司党委书记。在兴县工作的就更多了，如袁炭冰（晋恩、崑县）曾任兴县专署副专员；又如兴中一班学生贾维桢抗战初期即参加动委会，历任忻、朔两县县长，以后一直在根据地工作，历任师范、高

中教师三十余年，81年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县政协副主席。武丕功抗战时任保德教育科长，后任兴中校长二十余年。杨笃仁任县民政科科长，现任县政协委员。张立、康荣旺先后任兴中教导主任，后任魏中校长，张立现任县政协委员。康舒新历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商业局局长等职。胡建国历任县人民银行行长。康少钧历任兴中校长、县文教部副部长。其他如高克恩、刘九维、曹振德、孙济泽、康维城等同志一直在兴任教多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牛映涛、李绍春、张特当医生，济世活人，颇受群众欢迎。以上只是个人能够回忆到的，此外也有不少同学默默无闻地在不同的岗位上做过许多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不一一列举。

总之，兴县中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而创办的。当时在晋西北是唯一的一所中等学校。尽管经过时间不算长，培养人才不算多，但它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变革时期，它对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特别在抗日战争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个学校的历届学生绝大部分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以及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至今大部同志虽年过花甲，甚至有的年逾古稀，但他们壮心不已，继续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发挥余热。真是“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回首当年，老一代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成长是艰难曲折的；展望未来，青年一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能够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贾 维 桢

红军东征兴县

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声威所及，大大引起了阎锡山的严重不安，阎锡山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竭力阻挠红军北上。在此国难当头，党中央、毛主席深明大义，一再劝告阎锡山停止反共，团结抗日，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突破阎锡山的严密封锁，从中阳、石楼等地强渡黄河，直抵太原的南大门——汾阳、孝义。阎锡山惊恐万状，抽调重兵阻截红军北上。毛主席运筹帷幄，避实乘虚，在苑九峪打了一仗。随即乘胜前进，直取交城、文水。但由于阎锡山的大兵压境，严重阻塞红军的去路所以不得不暂时迴旋于晋西北。

就在这个时候，由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陕北红军二十八军，为了配合红军东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从兴县罗峪口过河，一举歼灭了阎锡山的河防部队丁炳青所属216旅的一个营，打死梁营长，赶走顽固军，解放了罗峪口。

罗峪口之战攻克神速，战斗打得漂亮，其主要原因是陕北红军地下党的工作做得周全。红三团王兆相同志和罗峪口附近的共产党员早有接触，活动频繁。这次东征，红军事先通知黄家里党员王治礼指示桑湾村的白桂成、王立明，星夜割断罗峪口驻军和兴县政府的电话线，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同时，组织沿黄河一带的群众把“洪筒”准备好：三个一组，五个一群，连成一片，绑在木梯上支援红军渡河。然后，在王化滩燃起一堆柴火，红军看见河东的讯号，立

即强渡。而驻守在罗峪口的梁营长发现红军渡河，命令他的部队坚守阵地，拚命阻击。红军在河西沙峁头用轻重机枪掩护，红三团二营五连的战士，从沙王坡以上乘船渡河，直达河东岸，首先攻破了李家梁村北的两个中心碉堡，拔掉了敌人的两挺机关枪，减轻了敌人的火力射击。随后，红军大队一涌而下，奋勇挺进，一举推进到罗峪口的东岸。红军战士一个个如虎添翼，所向无敌，他们不畏敌人的枪林弹雨，由罗峪口附近的共产党员带路，直冲阎锡山在罗峪口设置的指挥部，当场击毙了阎军的指挥官——梁营长。阎锡山的守军群龙无首，其他指战员全都举手投降了。

红军在罗峪口战斗中，歼灭了阎锡山的一个营，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打了一个漂亮仗。但红军战地也遭受了一些损失，一部分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身负重伤。由于当时医药条件困难。所以抢救伤员就是一个十分紧急的任务。刘志丹找到沿河一带的几个党员，要他们想办法找一位医生。王治礼建议，最好请牛大业。他说：“牛大业的医术较好，只要能请到此人，红军的伤员就有救了。可是牛大业是否能给红军治病……。”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派了几个红军指士，由王治礼带路，连夜跑到了韩家营，包围了牛大业的院子，打了几枪，把牛大业捆起来带走了。当时群众不明真象，以为牛大业是财主，红军专门打富济贫，牛大业此去不会有好结果。牛大业的家属嚎啕大哭，王治礼没敢露面，红军战士把牛大业带到罗峪口，王兆相亲解其绑，并热情地给他倒水让坐。牛大业蒙里蒙眛，不知是怎回事，见红军首长热情和气，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了，王兆相对他说：“牛先生，我们这次请你来，是让你给红军办点好事。现在我们有一批战士受伤，深知你医技高明，又不

便公开请你，只好把你捆来，这是我们的一种策略，否则白军将会伤害你家属的。”牛大业一听恍然大悟，深感红军办事有方。王治礼也劝说牛大业，要他放大胆子抢救伤员。牛大业在红军的感召下，欣然接受为红军效劳，后来据人们的回忆，经牛大业治愈的红军战士不下数十人，红军走时给他放下几十元白洋，牛大业文分不收，并要求参加红军，王兆相见牛大业有诚意，便带他当了随军医生。

红军在罗峪口住了几天，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三月八日，翻山北上，沿着蔚汾河和中央红军会师。此时，驻守在兴县城内的防共保卫团团长尚学勤得知红军东进，吓得惊恐万状。他立即电告阎锡山要求派兵增援，阎锡山接到尚学勤的报告，很快命令驻守在中阳、离石一带的七十一师二〇七旅长温玉如率部前往兴县阻击红军。温玉如奉命日夜兼程，向兴县进发。其时，由徐海东率领的中央红十五军团转战岚县，得知阎锡山派兵从南线阻击，于是和刘志丹取得联系，两军在界河口会师，暂时放弃进攻兴县城。取道直奔康宁镇，在曹家坡摆开口袋战，单等阎军进入伏击圈。

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许，温玉如率六百余名先遣队进入康宁镇，喘息片刻，便整队出发。当地的部队走到鹁于堽附近，红军指挥员一声令下，四面出击，把阎军包围起来。温玉如一听枪声，知道中了埋伏前进不得，只好调头南逃，岂知红军早已切断他的后路。温玉如见红军人多势大，只好硬着头皮突围。守卫在西山上的红军战士，面对狗急跳墙的敌人，以密集的手榴弹痛击，连续打退敌人三次突围。到下午十四点多，敌又组织了第四次突围。他们兵分两